

● 安旗主編

新版

李白全集編年注釋

上



巴蜀書社

● 安旗 閻琦 薛天緯 房日晰

新版李白全集編年注釋
上

● 巴蜀書社 中國·成都



新版前言

李白詩文集，千餘年來只有分類本（即按詩文體裁分類者），而無編年本（即按年代先后編次者）。

魯迅先生說：「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，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。倘要知人論世，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。」（《且介亭雜文·序言》）

中國之有李集編年本，自拙編始。

為李集編年，殊非易事。以我等之學識從事此項開拓性工程，本難勝任，但出於宏揚中華文化之責任感，填補千年空白之迫切感，我等嘔心瀝血，以勤補拙，決心跨出這艱難的第一步。

拙編曾於一九九〇年由巴蜀書社初版，并兩次印行。雖然曾獲好評，畢竟遺憾良多，有負讀者厚愛。因此在舊版本基礎上又經為時數年之琢磨，加以修訂。諸如前此未能編年或編年有誤者，今已予以補正；前此當注而未注，或雖注而未善，以及注文繁簡失當者，今已加以處理；前此有數詩，因比興未明、虛實莫辨、表里不分，以致失其真諦，甚至影響前後若干作品者，今已有所省悟。從而使李白其人及其詩之廬山真面目得以進一步顯現。

論李白

(代前言)

李白是一位偉大的詩人。他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詩文，傳世的千有餘篇，其中絕大部分都具有相當的意義和價值，數以百計的名篇傑作更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，全人類的精神財富。但是過去一千多年來對李白的研究很不够。他的生平事跡多不詳，他的作品也多有未解或解而有誤，致使其人及其作品沒有得到充分的介紹和準確的評價，甚至還遭到歪曲。

近十年來，我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，李白研究方面尤為活躍，新說迭出，成果累累，解決了不少前人未曾解決的問題。學術界的共同努力為給李白作出新的介紹和評價提供了基礎，本文就是在這種基礎上略陳管見，作為我個人對李白的基本看法。

關於李白的生平

李白，字太白，生於唐代武則天長安元年（公元七〇一年）。他的活動主要在玄宗、肅宗兩朝，唐代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。

唐前期，唐玄宗是一個英明的帝王。他任賢用能，勵精圖治，使唐王朝達到它的極盛時期，成為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。『開元之治』的陽光激發了許多人的雄心壯志，秉賦優異和富於幻想的少年李白更感到它具有無比的魅力。

開元十二年，李白二十四歲。他認為『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，乃仗劍去國，辭親遠遊』。臨行，有《別匡山》一詩，詩末寫道：『莫謂無心戀清景，已將書劍許明時。』他早已下定決心，要把他的文才武藝奉獻給大唐王朝。他之辭親遠遊主要就是為了尋求政治出路。

初出三峽的李白好像大鵬展翅。此年所作的《大鵬遇希有鳥賦》（後改為《大鵬賦》）就是他的自我寫照。從此賦中可以看出，李白的政治抱負不是僅僅要取得一官半職，而是要趁着大好時代幹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。

開元十五年，李白二十七歲，入贅安陸許氏。他在此年所作《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》中寫道：『申管晏之談，謀帝王之術，奮其智能，願為輔弼，使寰區大定，海縣清一。事君之道成，榮親之義畢，然後與陶朱、留侯浮五湖，戲滄洲，不足為難矣。』由此可知，李白政治抱負的具體內容是：輔佐帝王，濟蒼生，安社稷，然後功成身退。

但自出蜀以來，『遍干諸侯』皆無結果，只落得『南徙莫從，北遊失路。孤劍誰托，悲歌自憐』，於是李白寄希望於上長安。他在《上安州裴長史書》中寫道：『若赫然作威，加以大怒，不許門下，逐之長途。白即膝行於前，再拜而去，西入秦海，一觀國風。永辭君侯，黃鵠舉矣。何王公大人之門』

不可以彈長劍乎？」顯然，他以為在地方上找不到出路，上京師去當能如願以償。

開元十八年春夏間，李白第一次上了長安。「歷抵卿相」仍無結果，徘徊魏闕之下不得其門而入，只落得與遊俠兒、鬪鷄徒為伍；又因誤與「五陵豪」相交，而有北門之厄，受到這一伙禁軍中的流氓地痞的圍攻。在落魄長安的同時，却看見宦官們甲第連雲，鬪鷄徒們冠蓋輝赫。相形之下，李白大為不平，大惑不解，對他抱有無限希望的「明時」開始感到懷疑和失望。《行路難》（其二）、《蜀道難》等詩即此期抒懷之作。

李白初入長安失敗後，無顏回家，乃東遊梁宋，訪道嵩山，寄跡元丹丘潁陽山居，然後又在洛陽過了一段「黃金白璧買歌笑，一醉累月輕王侯」的狂放生活。重要作品有《梁園吟》、《梁甫吟》等詩。後二年出遊襄陽，謁見當時頗有推賢進士之名的韓朝宗，求薦又不遂。重要作品有《襄陽歌》、《與韓荆州書》等詩文。開元後期，李白又曾北遊太原，南遊江淮，重要作品有《將進酒》、《夜泊牛渚懷古》、《惜餘春賦》等詩文。

開元二十八年，李白移家東魯，卜居兗州（魯郡）治城瑕丘東門外二里之沙丘。封為道門威儀，隨玉真公主朝謁譙郡真源宮並受道王屋山仙人壇。丹丘受李白之託，薦之於玉真，玉真又薦之於玄宗，於是天寶元年秋李白亦奉詔入朝，是為再入長安。玄宗召見金鑾，優禮有加，並命待詔翰林。但此時玄宗勵精圖治之心早已消歇，已經從一個英明的帝王蛻化為一個安樂天子，他之召李白入朝只不過借以裝

點太平。李白入朝之初還以為他大展鴻圖的美夢即將實現。但一次又一次地奉詔應制却只是侍從宴遊，使他又陷入失望；加以受人妬忌，遭人讒謗，更使他感到苦惱。天寶二年夏已是身在魏闕，心存江湖；天寶二年秋更是詠歌之際，屢稱東山。此期所寫的一大批宮怨詩，實際多是待詔翰林生活的自況；此期所寫的一大批思邊詩，實際多是對朝廷窮兵黷武的不滿；同時對玄宗的荒淫生活也有所諷刺。從李陽冰《草堂集序》中『丑正同列，害能成謗，格言不入，帝用疏之』這幾句話看來，李白對玄宗曾有過諫諍之言，玄宗不但不採納，反而聽信讒言疏遠了他。天寶三載春，李白經過多日徘徊以後，終於下定決心，請求『還山』。玄宗亦以其『非廊廟器』，又慮其『言溫室樹』，而乘勢打發了他。臨行，李白不免感慨萬端，或詠鸚鵡，或悲流水，或寄喻宮女，或托言棄婦，寫了一系列詩篇抒發他的辭闕心情。當年回到東魯後，為了借宗教麻痺他創痛巨深的心靈，李白在濟南紫極宮受了道籙；又自構酒樓一座，日夜沉飲其上，少有醒時。隨後，就大病了一場。

天寶五載病愈後，為了借遠遊以消憂，李白自東魯南下越中，行前有《夢遊天姥吟留別》一詩記其入朝去朝之南柯夢及幻滅感。

由於唐玄宗荒淫無道，李林甫等人助紂為虐，外則窮兵黷武，內則屢興大獄，天寶中期朝政更趨昏暗。李白一連幾年滯留吳越，寓居金陵，表面上生活十分狂放，實際上內心却十分痛苦。他既為自己被斥去朝憤憤不已，又為朝政昏暗憂心忡忡。此期一系列覽古、懷古之詩實際上都是借古諷今之

作；《戰城南》、《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》等詩更是直抒胸臆，抨擊時政。

天寶十載秋，畜謀已久決心作亂的安祿山，派人至內地羅致名士，李白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意在親入虎穴，探明祿山反迹以上報朝廷，速取對策而止禍亂于未發。十一載十月到幽州後，果然危機嚴重，禍在眉睫。李白憂心如焚，攬涕呼天，趁安祿山人朝未歸，隨即離去。此行有詩多首，始于《贈何七判官昌浩》，終於《北風行》。

天寶十二載早春，李白從幽州回到河南後，隨即又有三人長安之行。但到了長安之後，他看到滿朝文武猶自歌舞昇平，不知危亡已在旦夕；他聽到楊國忠一伙狐羣狗黨竊據高位，而自己却報國無門；他感到玄宗迷而不省，已快成亡國之君；最後只好懷着「辭楚」「避秦」的心情離開了長安。此行有詩多首，或抒危亡之感，或作窮途之哭，或嗟嘆世風澆漓，或決心遁世避禍，尤以「上哥舒大夫」一詩為此行之金匱，中藏李白一片孤臣孽子之心。但在臨行之際和既去以後，却又繫心君國，眷戀長安，既對國家命運憂心不已，又以報國無路含恨無窮，因而有《遠別離》之作。

是年秋，李白南下宣城。雖然他屢有出世之語，實則憂時之心無時或忘。《橫江詞六首》、《古朗月行》、《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》等詩都是此期憂時傷事之作。

天寶十四載（公元七五五年）十一月，安史之亂果然爆發。唐王朝瀕臨滅亡。安史亂起以後，李白又想有所作為，經過一番奔走，終於不能有所作為，而避亂入廬山。《菩薩蠻》、《憶秦娥》二詞當作於

此時。這兩首詞都是抒寫懷念長安、哀悼故國之情。

是年七月，太子李亨在朔方靈武即位，改元至德，是為肅宗。永王璘則奉玄宗「制置」出鎮江陵。次年正月永王璘出兵東巡，派人上廬山徵聘李白。李白懷着救國之心參加了永王軍幕，不料却墮入統治者們爭權奪位的漩渦。竟以「附逆作亂」的罪名入獄，後又被判「長流夜郎」。

長安、洛陽兩京收復以後，遇赦放還的李白竟又幻想東山再起，奔走結果只是自取其辱。直到他去世前一年，還想去參加李光弼的軍隊，後因半道病還，未果。

唐代宗廣德元年（公元七六三年），李白六十三歲，卒於當塗。在他的絕命詩《臨路歌》（應作《臨終歌》）中，仍以大鵬自喻，雖為自己的政治抱負未能實現而感到遺憾，却對自己的詩歌將傳之不朽作了豪邁的預言。

以上是我所了解的李白一生的基本情況，其中不少地方和前人的介紹頗有出入。凡有重大出入的地方，將在這部編年全集中得到說明。

二 關於李白的思想

李白的思想，確如一些論者所說，十分複雜，充滿矛盾。他集儒、道、釋、縱橫等各家思想於一身，又好擊劍任俠，又想棄文就武，又曾宣揚人生若夢，主張及時行樂，而且被人視為「甘酒好色」。

他多次以孔子自喻，却也多次嘲笑孔子，更看不起「白髮死章句」的小儒。他熱衷於學道求仙，而且受過道籙煉過丹，但他對神仙之事又表示懷疑，說是「仙人殊恍惚，未若醉中真」，甚至說「蟹螯即金液，糟丘即蓬萊」，而且多次批判唐玄宗迷信神仙。他「遍干諸侯」，「歷抵卿相」，滿世界尋求政治出路，却又多次說要隱居，要出世，要去尋找桃花源。李白的思想真像一個大雜燴，甚至是一團亂麻。

但是，李白的思想在複雜性中自有他的單純性，在矛盾性中自有他的統一性，在他形形色色的思想中自有一根巨大的紅綫貫串始終。這就是封建盛世激發起來的雄心壯志，要實現偉大的抱負，要建立不朽的功業。一念之貞，終身不渝，欲罷不能，至死方休。在這一點上，他同屈原一樣，同杜甫一樣，同一切偉大的歷史人物一樣，他們的一生都像是一場熱戀，一場苦戀，一場生死戀。這是在為十年的研究中，李白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。也只有理解他這種思想品格，才能理解他的一切。

李白一生好漫遊四方，有人便以為他一生悠哉遊哉，超然飄然，似乎是一個無所事事的安樂公子、富貴閑人。其實并非如此。

開元天寶中，朝廷雖然屢下求才之詔，但是當時懷才抱藝之士若無適當的人推薦也難有出頭之日。孟浩然《田園作》云：「鄉曲無知己，朝端乏親故。誰能為揚雄，一薦《甘泉賦》？」即可見一斑。唐代士人漫遊成風，除了其他原因外，主要是為了廣事干謁，尋找「知己」。「知己」一詞在當時是有特定含義的，即各級官吏中能够識拔自己并薦之於朝廷的人。李白漫遊四方也是如此。正是為了

尋找能够識拔他這匹千里馬的伯樂，為了尋找政治出路，他長年在外奔走不息。他對故鄉「清景」無限依戀，但却辭親遠遊，一去忘返。他和許氏夫人伉儷情篤，《寄遠十二首》（大部分是贈內詩或自代內贈）寫得何等纏綿悱惻，但他一外出就是兩年三年不歸。他對子女充滿了父愛，《寄東魯二稚子》等詩可謂舐犢情深，但他却長年拋下他們。他和續娶的宗氏夫人志同道合，但新婚宴爾他就跑到龍潭虎穴去冒險。即使在居家時寫的一些閑適詩中，我們也可以感到有一種思想感情在他心中起伏，迴旋，激蕩。這就是深恐辜負明時，虛度此生。因此早在三十幾歲他就屢悲白髮，頗惜餘春，「恨不能掛長繩於青天，繫此西飛之白日」。即使他在閉門讀道書，靜談《秋水篇》時，他心裏未必真正安靜過，轉眼之間他又可能熱血沸騰。他的政治抱負和用世熱情使他不得安生，在唐王朝的廣大國土上，在六十三年的人生道路上，他實際上是在不停地奔波，尋覓，追求，奮鬥。

固然，李白一生確實遊了不少名山大川，寫了不少優美的風景詩，但風景詩只不過是他的副產品。他在《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》中寫道：「每思欲遐登蓬萊，極目四海，手弄白日，頂摩蒼穹，揮斥幽憤，不可得也。」他又在《赤壁歌送別》中寫道：「一一書來報故人，我欲因之壯心魄。」他又在《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》中寫道：「余方窺石鏡，兼得窮江源。將欲繼風雅，豈徒清心魂？」可見李白「一生好入名山遊」的真正目的，是為了「壯心魄」，「清心魂」，「繼風雅」，「揮斥幽憤」。也就是說，是為了開豁心胸，滌蕩靈魂，是為了取得靈感和形象，以抒寫他的壯志豪情，以揮斥他幽深的憤懣。

李白正是在漫遊中走遍了中國大地，經歷了廣闊的生活，嘗盡了人生的甜酸苦辣，切身感受到唐王朝的盛衰轉折，所以他的創作有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，有着得心應手的比興手段，從而能够「開口成文，揮翰霧散」，使人感到彷彿如有神助。

又有人認為李白是一個「祇知狂醉於花月之間，蒼生社稷曾不係其心膂」的人。其實恰恰相反。

按着年代先後考察李白詩歌，可以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：開元前期，唐王朝陽光燦爛，李白詩歌中也呈現出一派天朗氣清、風和日麗的景象。《峨眉山月歌》、《初下荊門》、《金陵酒肆留別》、《越女詞》諸作最為典型。在這些作品中很少感慨，更無牢騷，即使抒寫離情別緒也使人心曠神怡。開元中期以後，唐王朝本來潛伏着的陰影逐漸出現，李白的詩歌中也呈現出明暗交錯，悲歡雜糅的色調。《行路難》（其一）、《梁園吟》、《梁甫吟》、《將進酒》諸作最為典型。在這些作品中，感慨和牢騷就多起來，但旋發牢騷旋又自慰自解，往往在最後還有一個光明的尾巴。天寶中，唐王朝烏雲滿天，黃風匝地，李白的詩歌中也出現了陣陣閃電和雷鳴。《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》和《戰城南》等詩最為典型。到了天寶季葉，大亂前夕，唐王朝已是危若累卵，禍在眉睫，李白詩歌中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憂憤深廣的特點，有些詩簡直是血淚交織。《遠別離》、《橫江詞六首》、《古朗月行》、《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》等詩最為典型。李白的詩歌同唐王朝的時政和國運，真是如月在水，如影隨形。

正因為李白時刻關注着時政的清濁和國運的盛衰，所以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。當開元之治如日中天之際，他就開始覺察到它的陰影，首先是對朝廷廣開才路發生懷疑。他在《行路難》（其二）中

大聲疾呼：「大道如青天，我獨不得出！」他在《蜀道難》中驚呼吶喊：「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！」他在《襄陽歌》中以「襄王雲雨」隱喻朝廷恩澤而發出「今安在」的質問，都是這種懷疑的表現。他在《孤蘭生幽園》（古風）其三十八）中「雖照陽春輝，復悲高秋月」的感慨，實際上是對唐王朝廣開才路的兩重性的藝術概括。開元後期唐玄宗漸重邊功，屢事征伐，當捷報頻傳之日，李白不以為喜，反以為憂。他在《鄴中贈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中幽居》一詩中寫道：「君王制六合，海塞無交兵。壯士伏草間，沉憂亂縱橫。」他又在《贈從弟冽》中寫道：「羌戎事未息，君子悲塗泥。報國有長策，成功羞執珪。」認為屢事征伐不是安邊的上策，感到窮兵黷武必將禍國殃民。天寶初年李白奉詔入朝，雖然由於一時興奮寫了一些「揄揚九重萬乘主」之作，但不久他就感到玄宗的耽於淫樂有類吳王夫差，因而寫下了《烏棲曲》，表面上極寫其歡樂，實際上透露出麋鹿遊於姑蘇臺的預感。天寶末期三入長安獻策失敗後，李白心中更充滿了社稷傾危、禍在眉睫之感，寫下了一大批憂時傷事之作，透露出亡國的徵兆，甚至說出「明年祖龍死」這樣的話，預言玄宗的末日將臨。果然兩年以後，安史之亂就爆發了。對盛唐時局的轉折所產生的不安感、不祥感、傾危感，以及由此而來的憂慮、憤怒和痛心，雖然在唐代其他詩人作品中也有所表現，但以李杜二人的作品表現得最頻繁，最深沉，最強烈。

在這一點上，李白與杜甫多次表現出驚人的一致。天寶中葉石堡一役，暴露出唐玄宗窮兵黷武已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。他們二人雖然遠隔千里，一個在江東，一個在長安，却不約而同地向朝廷的暴

政怒飛鳴鏑，這就是李白的《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》和杜甫的《兵車行》等詩。天寶季葉，杜甫登上慈恩寺塔，感念時事，百憂交集，寫下「秦山忽破碎，涇渭不可求。俯視但一氣，焉能辨皇州」這樣的詩句時，李白也幾乎在同時寫下「殷后亂天紀，楚懷亦已昏。夷羊滿中野，菘蔬盈高門」這樣的詩句。同樣的政治預感，同樣的憂國情懷，深深浸透在他們兩人的許多作品中。

又有人以為李白思想中存在着人世和出世的矛盾，這種看法也似是而非。並不是說李白沒有出世思想，也不是說李白的出世思想微不足道。值得注意的是：人世和出世的矛盾不是在李白思想中一半對一半（也不是以任何比例）靜止地對峙着，而是隨着時局的變化和個人的遭遇不斷地消長着，發展着。總的說來，開元時期李白的出世思想較淡，天寶時期較濃，天寶後期最濃。每一次從政治活動之始，他意氣昂揚，精神煥發，出世思想就消失得無影無踪；隨着情況的轉折，出世思想又來到他心裏；失敗成為定局，沉重的打擊降落到他頭上，出世思想就似乎充塞他整個心靈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：他常常說着隱居出世之類的话，而又不甘於隱居出世。初入長安失敗後，遍登嵩山三十六峰，頗有出世之思，但返安陸途中經過南陽時，崔宗之約他去嵩山隱居，他却說：「但得長把袂，何必嵩丘山？」開元後期的江淮之行途中，鄴中王大勸他人高鳳石門山中去隱居，他也不肯去，而要「建功及春榮」。天寶三載被斥去朝後，出世思想空前濃厚，甚至受了道籙，但就在次年他又給友人、代理監察御史的崔成甫接連贈詩。詩中寫道：「扶搖應借力，桃李願成蔭。」「風濤儼相因，更欲凌崑墟。」在《金鄉送韋八之西京》詩中，他也寫道：「客自長安來，還歸長安去。狂風吹我心，西挂咸陽樹。」

所以注家蕭士贇、王琦多次說他「身在江湖，心存魏闕」。去朝十年中，他說是「十年罷西笑」，對朝廷不抱希望了；而且「閉劍琉璃匣，煉丹紫翠房」，把用世之心收拾起來了。但恰在這十年中他寫出了大批的借古諷今之作和《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》這樣直抒胸臆、抨擊朝政的作品。天寶十一載，他正說要和元丹丘一塊兒隱居，甚至要舉家就之，却又拂劍而起，去了幽州。三入長安獻策失敗後，他幾乎是賭咒發誓地要避世去了，但《古朗月行》等一大批椎心泣血的憂時之作，又正是這一時期寫的。安史亂後，他遭了天大的冤枉，吃了够多的苦頭，該要「接受經驗教訓」了。他在監獄中和流放中，也曾打算獲釋後即以學道煉丹了却殘生，不敢再有他想。但在巫山遇赦以後，他既不回到多年想念的西蜀老家去看看，也不回到望眼欲穿的宗氏夫人身旁，却急匆匆地趕到當時南方政治中心——江夏，圖謀東山再起，參與興復大業。在李白一生中，這種例子是舉不勝舉的。他幾乎是一邊說着出世的話，一邊又在做着用世的打算。使人感到他所謂出世云云，往往是作為暫時的自我緩解，說說而已，甚至是其言愈冷，其心愈熱。

李白的出世思想當作如是觀，李白的及時行樂的思想和行徑，亦當作如是觀。這都是他的政治抱負不能實現，政治熱情無處寄托，特別是在遭受失敗和打擊之後，一種無可奈何的發泄。細心的讀者不難在他的尋歡作樂、放浪形骸的詩篇背後，發現他充滿痛苦和憤懣的心靈。

總而言之，李白的思想無論多復雜，自有他的主心骨，李白的性格再是多側面，自有他光輝的正面；李白的情緒盡管多反復，却是萬變不離其宗。

歸根結底，李白是一個抱有偉大理想的人，富於用世熱情的人，對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極為關心的人。為了實現他的理想，他一生追求不已，奮鬥不止。雖然屢遭失敗，歷盡坎坷，却是九死不悔，直到生命最後一息。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，都具有這樣的思想品格。正是這樣的思想品格，使他們成就了不朽的事業。即使失之東隅，也必定收之桑榆。李白雖然未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，却成了偉大的詩人。

只有掌握李白思想中這根巨大的貫串始終的紅綫，我們才能認識真正的李白，而不至於抓住他嘲笑儒家的片言，就說他是「法家」；抓住他人道和奉佛的側面，就說他是「迷信道教」，「甘心自縛於枯禪」；抓住他某些表面現象或生活小節，就說他是「頹廢文人」。

三 關於李白的詩歌

李白的詩歌，汪洋浩瀚，豐富多彩，光焰萬丈，美不勝收。關於李詩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一般情況，前人已有過不少介紹。這裏只談兩點前人尚未涉及或很少涉及甚至被人忽視的問題，而這兩點也許有助於掌握李詩的命脈。

(一) 李詩與比興言志

比興言志，源於《詩》《騷》，是我國古代詩歌的優良傳統。歷代詩人都或多或少有所繼承和發